

中国现代
文学馆
青年批评家丛书
第二辑

李丹梦 著

文学“乡土”的 地方精神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李丹梦 著

文学“乡土”的 地方精神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乡土”的地方精神 / 李丹梦著.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6

(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

ISBN 978-7-301-24420-3

I. ①文…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乡土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6220 号



书名: 文学“乡土”的地方精神

著作责任者: 李丹梦 著

责任编辑: 黄敏劼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420-3/I·279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3.25 印张 333 千字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0.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

丛书主编 吴义勤

丛书总序

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在巴金先生倡议和一大批著名作家的响应下，于1985年正式成立的国家级文学馆，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文学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保管、整理、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书籍、期刊以及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著作、手稿、译本、书信、日记、录音、录像、照片、文物等文学档案资料，为文化的薪传和文学史的建构与研究提供服务。建馆二十多年以来，经过一代代文学馆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现已成为集文学展览馆、文学图书馆、文学档案馆以及文学理论研究、文学交流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文学博物馆，并正朝着建成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料中心、展览中心、交流中心和研究中心的目标迈进。

为了加快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中心建设的步伐，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决定从2011年起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客座研究员制度，并希望把客座研究员制度与对青年批评家的培养结合起来。因为，青年批评家的成长问题不仅是批评界内部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对于整个青年作家队伍乃至整个文学的未来都具有方向性的问题。青年评论家成长滞后，特别是代际层面上“70后”“80后”批评家成长的滞后，曾经引起了文学界乃至全社会的普遍担忧甚至焦虑。因此，客座研究员的招聘主要面向“70后”“80后”批评家，我们希望通过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个学术平台为青年评论家的成长创造条件。经过自主申报、专家推荐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委员会的严格评审，中国现代文学馆已经招聘了两期共19名青年评论家作为客座研究员。第三批客座研究员的招聘工作也即将完成。

两年多来的实践表明，客座研究员制度行之有效，令人满意。正如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同志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批客座研究员聘任仪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青年评论家在学术上、思想上的成长和进步非常迅速。借助客座研究员这个平台，通过参加高水平的学术例会和学术会议，他们以鲜明的学术风格和学术姿态快速进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现场，关注最新的文学现象、重视同代际作家的创作，对于网络文学、类型小说、青春文学等最有活力的文学创作进行即时研究，有力地介入和参与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在对青年作家的研究及引领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70后”“80后”批评家的代表，他们的“集体亮相”，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格局和结构，带动了一批同代际优秀青年批评家的成长，标志着“70后”“80后”青年批评家群体的崛起。鉴于客座研究员工作的美好成效和巨大社会反响，李冰书记在第一批客座研究员到期离馆时曾专门作出了“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要进一步扩大规模”的批示。

为了充分展示客座研究员这一青年批评家群体的成就与风采，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决定推出“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评论家丛书”，为每一个客座研究员推出一本代表其风格与水平的评论集，我们希望这套书既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收获，又能够成为青年批评家们个人成长道路的见证。丛书第一辑8本在2013年6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后引起了巨大反响，现在第二辑12本也即将付梓出版，我们对之同样充满期待。

是为序。

吴义勤

2014年春于文学馆

目 录

丛书总序 吴义勤 3

上篇 史 论

引 论 作为认同构造的现代文学“乡土” 2

第一章 地方性文化视角的兴起 32

第一节 引入“主体” 32

第二节 1990年代以来文学“乡土”的变迁 36

第三节 “中国”的式微与“原子”个体 39

第四节 “乡土”认同的思维结构 43

第五节 地方文化视角的兴起 46

第六节 从“寻根”到“地方” 49

第二章 “中国”视域中的“河南” 55

第一节 豫籍作家皈依地方文化的“需要” 55

第二节 丑陋的“河南人” 61

第三节 中原衰落的历史及原因 64

第四节 河南文化精神的“造化演示”：黄河 67

第五节 河南，中国现代主体的“他者”或“代表”？ 69

第六节 “中国弃儿” 72

第七节 “中”的尴尬 78

第八节 河南现代文学的运命 80

中篇 综 论

第三章 话语与方法 84

第一节 何谓“话语”? 84

第二节 福柯的“地缘政治”与文化 88

第三节 主体与话语 91

第四章 “中原突破”的精神内涵 97

第一节 “弃儿”“寻根”与文化创伤 97

第二节 “伤口”凝视下的“中原突破” 104

第三节 一个典型个案:《坚硬如水》与“墓穴”记忆 110

第四节 河南现代文学里的“中国” 117

第五节 “寻根”的宿命 122

第五章 “中原突破”的话语形构 127

第一节 “乡土”话语的历史“索引” 127

第二节 官场话语 135

第三节 苦难话语 152

第四节 底层话语 173

第五节 历史话语 194

下篇 作家论

第六章 乔典运:现代中原“化石” 220

第七章 张宇:“软弱”与“鬼气”的叙述 245

第八章 李佩甫:卑贱的神圣之旅 261

第九章 阎连科:极端化写作的命运 281

第十章 刘震云:权力与人性的角逐 311

第十一章 李洱:反抒情的自我抒写 344

参考文献 362

上篇 史 论

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文学“乡土”(通称乡土文学)并非一般认为的仅是农村题材或农民小说,“乡土”与农民、农村有关,但本质上是个体认同的构造。在“乡土”中着力要解决的问题是:我是谁?我属于哪一类?1990年代以来,地方文化悄然兴起,它填补了作为价值的“中国”在式微后所形成的个体认同的结构性空缺。这显示了全球化背景下,人们对矛盾和不确定性的防卫式拒绝。地方文化的轮廓,建立在个体释放各种不同层次的原始记忆、情感或依恋的基础上。追溯、皈依地方文化的过程与争取和描述自我的连续性,互为表里。

引论 作为认同构造的现代文学“乡土”

在中国新文学的萌蘖、发展中，乡村生活与记忆一直是强韧而活跃的创作资源，这跟中国社会源远流长的农耕历史、小农经济有关（包括与之而俱的相对稳定的风俗伦理、交际人情等），而创作主体也或多或少跟农村、农民瓜葛着。“在土地提供的现实的知足感基础上，中国人达成高度的情感与知觉的认同；经由对土地生命周期的体认，进入到对乡土习尚礼俗的沿遵。”^①把“乡土中国”的称谓拆解开：乡，系具体、经验的乡村；而土，则指向本土、民族、国家的诉求。就构思、创作而言，它属于现代化的文学经营与想象范畴，不乏雄心与责任感。以1940年代的延安文学为例，这大概是将乡村生活与中国性质结合得最紧密、完整的典范。自然，这经历了一个过程。

如果定要从中国新文学中指认某种主潮或主流的话，当非乡土文学莫属。无论作者队伍的知名度、影响力，还是作品的数量与质量，乡土文学均独占鳌头。据庄汉新等人的统计：乡土小说作家占据了20世纪中国小说作家的大半以上。^②如此不约而同地奔赴、聚焦“乡土”，内中的心态与文化驱动殊堪回味。但让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乡土社会、乡村生活在那么长的时期内没有得到文学应有的重视呢？钱锺书在《宋诗选·序》中提到，古代作品中很少有反映下层农民生活的，只在“街谈巷语”中偶

^① 汪涌豪：《中国文化中的乡土意识与情怀》，载《文汇报》，2010年4月18日。

^② 庄汉新、邵明波主编：《中国20世纪乡土小说论评》，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见，而正统的文学体式（如五言诗、七言诗）与之几乎绝缘。茅盾也曾对“旧小说中农民典型之贫乏”^①倍感不解。从钱锺书、茅盾的设问立场看，这似乎要归结到阶级意识对民众主体的遮蔽，但钱、茅二人的阶级敏感也过于强大了些。纵观中国历来丰富浩荡的诗词歌赋，其中实在不乏乡村意象：“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乡村的呈现与自然的描绘、体悟融为一体。很难想象，如果去除了夕阳古道、鸟鸣虫吟、山泉林石、溪岸舟楫的点缀，古典诗词的韵致和意境还剩下什么？作为一种独特的文类系统，中国古诗词和乡土一样奠基于农业文明，它的词汇和意象、安详与洁癖，连同天人合一的感悟方式，无不与农业文明息息相关。一个突出而有趣的反例是穆旦所作的《五月》：当作者在拟仿的七言诗行中插入“乞丐”“勃朗宁”“毛瑟”等语汇时，七言诗的韵味已全然走样，由此活现了身陷传统的现代诗人的叛逆与挣扎。对于古代文人、知识分子而言，“乡土”并非一个独立的文化空间，它与自然及农业文明浑然一道，共同构成了文学生于兹长于兹的世界。古人感觉不出有将其分离、特写的必要。可以说，我们的文学传统或传统文学，就是一个乡土的世界。所谓乡村生活不受文学的“重视”，其根由应该就在这里。

现代人意识中的“乡土”，背后往往有城市的挤兑和压抑，对“乡土”的怀恋与自卑亦由此而来。马克思曾把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视为“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融合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今天”。^②但中国的情况有些特殊，虽然城市在商代就已出现，《战国策·赵策》中即有“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的记载，但不知为何，在文学的视域中，城市一直无法构成对“乡土”足够的威胁与挑战。这或许跟古代城市的建造往往出于政治、军事的需要有关，不像现在主要是为了发展经济与交流。古代城市大多居于战略要地，

① 茅盾：《大题小解》，收入《茅盾全集》（第2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2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6页。

与乡村一样封闭自守。在社会构成上，无论是总体的官民结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血缘、伦理纽带，均可见出乡村宗法结构的投影。由于城乡对峙的模式始终没有确立起来，“乡土”在古人那里便停留于一种模糊的状态。它天然自足又没知觉，即使如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样带有明显城乡对比意味的细节，其描述的重点亦不在“乡土”。姥姥故事的丢乖卖丑与女儿们的欢声笑语冲淡了因城乡差异、身份沟壑导致的沉重，它更像是大观园中上演的一出喜剧事件。联系最终的贾府败落以及姥姥救巧姐^①，城乡比衬的故事预期便淹没在曹雪芹对“人生变幻、世事无常”的思索中了。

虽然古人并未形成对“乡土”的自觉，套用佛学用语，即“计名字相”，但思乡的传统却甚是发达，《诗经·采薇》里便录有征人思乡的句子：“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凄苦之情跃然纸上。乡思的冲动，可追溯到农业社会孕育的安土重迁的文化心理。幅员辽阔，交通落后，然而迫于兵役、考试、游宦制度等，人们每每要远离故土，于是便出现了“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之类的句子。其中涉及的“乡土”大致和“家乡”同义。最脍炙人口的，要数“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了。在头举、头低间，乡思的涌动几乎成了古人在孤独、怅惘情绪中的条件反射。这类敏感、自然的（审美）反应亦为现代作家所承继，“乡土”由是凝聚了深沉的集体归属感。另外，因道家独善无为及退隐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广泛渗透，与自然交织、混同的“乡土”无形中又附上了抗衡权力的象征资本。文人在现世碰了壁，喜欢到田园、山川中寄托情愫，释解忧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便是这种心态的写照。在此可见出一种广义的“原乡”情结与抒情范式，依王德威的诠释：“原乡”中的“乡”，较之本来的“故乡”，义涵已发生了变化，它“不仅只是一地理上的位置，更代表了作者所向往的生活意义的源头，以及作品叙事

① 在《红楼梦》第五回，巧姐的判词这样写道：“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偶因济刘氏，巧得遇恩人。”由此推知巧姐在贾府势败后被“狠舅奸兄”所卖，后为刘姥姥所救。高鹗的续书与曹雪芹的原意不符。

力量的启动媒介”；^①这跟后来京派文人的乡土书写颇有会心之处。1930年代沈从文曾坦然自称“乡下人”，它让人想到陶渊明的归隐。任凭岁月荏苒，人心却又何其相似！在沈的从容与自信背后，“乡土”自古以来所附着的对抗权力的象征应该给了他不少底气吧。

由上所述，“乡土”在中国文学史上并非（本土）创作自觉的产物，这是一个现代的概念。简单地讲，“乡土”从暧昧趋向明朗和尖锐，系由现代性的焦灼与想象激发而来。

二

该如何把握“乡土文学”？三好将夫在讨论现代日本文学时指出：“日本文学正像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只是当它与时空的界限相联系时，才有可能加以界定。它也许十分显而易见是‘日本’的；但它的构成并不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神圣与绝对的纯而又纯。”^②这一思路同样适用于中国的乡土文学，只需将引文中的“日本文学”换为“乡土文学”，“‘日本’的”换作“‘中国’的”即可。我们必须谨记一点：所谓“乡土”，乃是历史构造的产物，一个现代性的话语装置。最明显的，“乡土文学”系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这一创作的世界潮流是我们（后发的）“乡土文学”的生长语境中不容忽视的部分^③；另外，美国乡土文论的核心概念 local

① 王德威：《原乡神话的追逐者》，收入《想象中国的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25页。

② 三好将夫：《反对种族中心主义》，转引自罗岗：《危机时刻的文化想象》，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63页。引文中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③ 乡土文学是工业化、城市化历程中的产物。资本主义的发展侵入乡镇与农村的生活，人们的心灵受到追名逐利、唯利是图思想的腐蚀。一部分来自乡土的作家感受到乡土堕落的危机，开始用笔描写美好、自然的乡土生活，以寻找安放灵魂的精神家园，由此形成了乡土文学创作的世界潮流。现代意义的乡土文学萌芽于18世纪中期的法国启蒙运动，在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正式诞生。法国的卢梭、乔治·桑、英国的华兹华斯、哈代、意大利的莱奥帕尔蒂、美国的福克纳、俄国的肖洛霍夫、印度的普列姆昌德、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中国的鲁迅、沈从文等，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就乡土文学的世界发展来看，它在中国形成较晚，大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距其诞生已近百年。

colour (或 local colorism)^① 直译过来便是“地方色彩”(或“地域色彩”),后者自周作人正式提出后,已成为国内“乡土文学”研究公认的关键词。丁帆的《中国乡土小说史》便以“三画四彩”^②对“乡土文学”进行概念界定,认为浓郁的“地域色彩”和“风俗画面”是现代乡土小说赖以存在的底色。话语旅行中的挪用、误解与变异提示我们,中国的“乡土”并非如其表面呈现的那样封闭自足,背后实潜伏着“西方”的纠葛与参照。这一参照在1990年代以来发生了变化,虽然“西方”的渗透与影响依旧存在,但它对文学“乡土”构思的宰制已大大下降。包括乡土似乎不可或缺的风格标签——“地方色彩”亦疏淡了不少,市场的崛起在此起到了犹如戒条解构(或解放?)的作用,一个唯我独尊的文学时代。这在后文将有详细的论述,此处略提一笔。

我并不赞同杰姆逊教授所谓“第三世界的文学都是民族寓言”^③的判断,但就“乡土”在中国的“发现”和规划(文学意义上的)而言,这一观点却不无洞见。作为新的文学风景,“乡土”在中国的崛起并非工业化、城市化的自然产物(这与经典意义上的世界“乡土”很不相同),准确地说,工业化、城市化不是文学“乡土”起源的主要动力;我们所谓的“乡土”,其形象是随着国家、民族意识的自觉、炽热而逐步清晰的。不理解这一点,便无从解释为什么“乡土”在中国会突然从混沌中跃出,而此前

① [美] 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刘保端译,收入《美国作家论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84页。原文如下:“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人无穷地、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

② “三画”指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四彩”指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离色彩、悲情色彩。参见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28页。

③ 杰姆逊的原话如下:“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参见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收入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5页。杰姆逊对第三世界的文化表述缺乏历史感,这是该观点的致命缺陷。他所说的第三世界文化,固着在被殖民、独裁和异化(阶段)的民族中,容易导致对象的同质化与切片化理解。说到底,“民族寓言”的提出,旨在拯救第一世界的人文贫困,而非为了呈现第三世界文化的细节或原貌。

它和城市并峙了几千年却懵懵懂懂、相安无事。在此，外来的刺激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清末以来，中西对抗过程中“中国”一系列的挫败、屈辱以及暴露出的黑暗与负面性成为文学“乡土”最初的核心构造。这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领衔的乡土小说流派中不乏其例：母亲省吃节用，为死去多年的女儿菊英张罗“婚事”（冥婚）。她确信菊英“现在非常的需要一个丈夫了”，凡女子到了十七八岁，哪有不想老公的呢？强烈、本能的母爱与无可救药的愚昧交织一处。有意味的是，当初菊英夭折，跟拒看西医有关。用“西药”医治中国儿女的病痛，这无疑显露了“乡土”思维中的启蒙结构（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朋友在路边发现一个壮健的婴儿，有心抱回，却因雇不起奶妈而犹豫不决，结果婴儿在雨夜里挣扎啼哭，遭野狗撕扯而死（台静农的《弃婴》）；已有意中人的静姑被父亲逼迫嫁给一个跛脚的傻老，她绝食数日，仍无法改变婚约。勉强出嫁后，又被闯进洞房的大兵强奸，最终沉塘自尽，“喜期”变了忌日（彭家煌的《喜期》）……如是悲苦无告、压抑阴郁的情境在“乡土”中不嫌重复地繁衍着，成为“乡村”的主色调。用鲁迅《故乡》中的话来说：“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乡村，没有一丝活气。”——它既是具体的描述，又是抽象和概括，一笔两面地写出了对故乡的伤怀和对国家的忧思。在上述作品中，我们不难体会“乡土中国”所谓的逻辑来由或理路：从“中国”到“乡土”，既是隐喻的指涉，又不无因果的激活与推导。

中国的文学“乡土”绝不仅是写实主义的，那些对它客观化的理解与界定，如农村题材、农民小说、地方色彩等，仅道出了“乡土”表相的一面。孙犁在1980年代初说过一句相当惊人、彻底的话：“所谓‘乡土文学’，实不存在。”这让他的好友、当时高标“乡土”旗帜的刘绍棠多少有些失望。^①我以为，“乡土”的本质乃是一种综合的认知与考量。在国人

① 孙犁：《关于“乡土文学”》，载《北京文学》，1981年第5期。原文如下：“就我个人的认识来说，我以为绍棠其实是可以不必这样说，也可以不必这样标榜的。因为，就文学艺术来说，微观言之，则所有文学作品，皆可称为‘乡土文学’；而宏观言之，则所谓‘乡土文学’，实不存在。”

的意识中，故乡、大地、生命本源、传统、祖国，隶属一个修辞系统，它们之间有着极为自然的符码互涉、衍生的关联。乡土文学的抒写，本能上倾向于历史与宏大叙事，其根由就在于此。

列文森曾指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①这也是他那部杰出的著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的核心观点与论证线索。“天下”观是与儒家的道，亦即中国自身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它是一个普世的概念，原则上涵盖全人类。作为一个道德共同体，“天下”中没有给出国家主权的界定，主权等同于皇帝的权力，这是儒学国家观与基督教国家观的最大不同。“当近代中国人被迫求助于外国的‘道’时，将国家置于文化亦即‘天下’之上，也就成了他们的策略之一……作为一个国家，它没有任何必须遵循的固定准则。但作为一种特定的文明，它就必须坚持某种价值观念，否则它就不成其为某种特定的文明了。但一个国家的选择是自由的，只要这种选择有助于其生存。”^②简言之，近代中国的演进乃是一个文化衰、国家兴的过程。念及19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各种文化热，其间的起伏、对比意味深长。它是国家感召力下降的标志么？（我在第一章会详述这一问题。）以此反观新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或许可将其视为中国身份的探索性表达（“乡土”兴盛的岁月亦是“中国”意志炽烈的时期）。除了显而易见的、对应国家实践及类似国民素质遴选的乡村建构、农民启蒙外，至为关键的还有知识分子自我筹划。对他们来说，问题着重不是要解答“乡村是怎样的”？而是“如何通过文学‘乡土’的创造，让自身成为能与西方平等对峙的主体？”这意味着，对民众负面性或病态心理的洞察、识见愈是深刻，摆脱歧视、屈辱和自我提升的效果则愈发显著。二者实在是一个过程。按赵园的说法：“文学中的怀乡病，多半是一种知识分子病。”^③此病与彼

① [美] 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4页。

② 同上书，第84、85页。

③ 赵园：《回归与漂泊——关于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乡土意识》，载《文艺研究》，1989年第4期。

病，当不无相通之处；一种将自我对象化后的扬弃过程。我在一篇论述鲁迅的乡土小说中曾详细阐释过。对创作主体鲁迅而言，

他愈有能力与人物建立起多元的联系，愈能保证其生存选择的开放性：每一次相逢或遭际，都衍生出一种重新开始生命的可能，一种自由的寻觅与伸展。这应该是文学“乡土”回馈给鲁迅最珍贵、最庄重的礼物。

鲁迅在“乡土”设计中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作为一个启蒙者去生活，一个相当素朴的信念。启蒙对鲁迅来说只是其行为（乡土书写）的框架，而他要在“乡土”里确定：一个名义上的启蒙战士是否最终必定得承认、经受精神上的异化与破产。

《故乡》结尾部分“路”的显现，乃是主体将自我迁移到多个他人的位置（“我”对中年闰土生存状态的理解与契合），并随后将这种迁移抽出的结果……这里没有启蒙式的高高在上或隔岸观火；首要和必须的，是关联或联系。在彼此的勾连、互涉中自我沉淀、梳理与协调……“乡土”的营构与生存之路的探寻是同一的。^①

认为乡土写作中凸显的启蒙主体与民众格格不入的想法，显然忽略了上述关联与内部的统一。无论怎样，未庄、鲁镇那带有趋同性的民众的出场——虽然他们最初大多面目卑微——是件大事，它透露出强烈的寻求集体（认同）归宿的意志与需要。

“乡土”内涵、品质的吊诡亦在于此：尽管从根底上，文学“乡土”的出现乃是源于个体的危机意识和发展需求，但表现出的却是区域性的群体同盟的愿望。村庄的封闭、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冷漠便带有上述政治

^① 李丹梦：《“侨民文学”与“异域情调”——关于鲁迅的乡土文论与乡土小说》，载《南方文坛》，2010年第5期。